

石刻所見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

陳, 尚君

復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唐宋文学 | 復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Literatur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ttps://doi.org/10.15017/9607>

出版情報 : 中国文学論集. 32, pp.53-71, 2003-12-25.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Kyushu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石刻所見玄宗朝的政治與文學

陳 尚 君

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是唐王朝最鼎盛的時期，也是唐文學最繁榮的時期。他與楊貴妃的長恨故事，更為後世所廣傳，演為淒絕千古的情豔故事。唐玄宗時期的政治與文學，前人已作過汗牛充棟的研究，已很難有新的突破。本文只是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所依據的史籍和筆記，記錄雖全面系統，但不免多由稍後的史官撰寫，表達後人的立場和見解，筆記傳聞尤有失實處。數量巨大的石刻，雖是為了具體的某事某人而作，但多能記錄當時的實況。近幾十年新發現的石刻為數衆多，其中傳達的資訊極其豐富。本文即列舉若干大端之問題，揭示石刻對有關史事的記錄，並稍作分析，希望對有關學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神龍、先天間的政局

從神龍元年（七〇五）初武后退位，到先天二年（七一二）太平公主覆亡，是唐代政局最波驚雲詭的幾年。這一時期的重要人物如崔玄暉、武懿宗、李多祚等墓誌都已出土，頗有可補史缺處。就玄宗發動唐隆政變的背景來說，值得重視的是韋皇后弟韋洵、韋泚兩方墓誌^①。兩人都在韋后早年落難時死去，當時都還年少，本身無事迹可稱道，但在神龍復辟後，韋洵贈淮陽郡王，韋泚贈上蔡郡王。同時，其兄韋洵贈汝南郡王，其父韋玄貞先贈上洛郡王，諡獻惠，僅隔一月，又贈豐國王，諡獻。這可看出韋家的僭越，但在當時異姓封王較寬濫，也屬多見不驚的事。兩方墓誌的形制規模，都比曾任皇太子而獲昭雪重葬的章懷太子李賢墓誌要大得多，顯見韋家勢力已壓倒李家。墓誌中稱韋后為順

天翊聖皇后，與中宗並稱二聖，稱韋氏兄弟所葬處為「先陵」，已在昭示新的女皇時代即將到來。其他石刻中可以舉出的迹象有，與韋家沾親帶故者多因懿戚承恩，一時假修佛道，濫度僧尼達兩萬多人，並徵良家女設「皇后齋郎」，獲鹿本願寺造幢題名，也有對「應天神龍皇帝、順天翊聖皇后」的祝願，等等。

時任潞州司馬的唐玄宗李隆基發起的誅滅韋氏集團的行動，「舊唐書·玄宗紀」稱是與太平公主謀，「公主喜，以子宗簡從。上乃與宗簡、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晷、寶昌寺僧普潤等定策」。『資治通鑑』卷二百九提到的參加者還有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等，麻嗣宗官則為利仁府折衝。舉兵的過程，史書記載較詳細。有二十多方墓誌涉及這次舉事，多數石刻都稱發生于「唐元年六月二十日」，還稱參與者為「唐元功臣」。所謂「唐元年」或「唐元」，都是唐隆元年的略稱，避玄宗諱而改。唐隆是韋后毒死中宗後扶立的小皇帝李重茂即位所改年號，玄宗時避諱省「隆」字。這次事變，應該稱為唐隆政變。政變主要策劃者之一，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的墓誌，近年已經出土，收藏于西安碑林，題作「大唐故袁州別駕薛府君墓誌銘」⁷，述政變過程云：

屬亂逆潛（僭）階，奸回密構，國步盈食蹠之虞，皇輿罹輔袴之災。虺蜮充于闕庭，梟鏡（獍）生於宮掖。皇上振不世之略，斬滔天之凶，忠實義形，謀惟契叶，佐滄海於熒爝之墜，助泰山於卵殼之場。大憝克清，元勳允舉。以功封立節郡王，食邑三千戶，上柱國。

所述形勢的危峻，其與玄宗的精誠合作，應是可信的。在太平覆亡後，他也被貶逐。宗簡叔薛徽，也是睿宗之婿，時任太常丞，也「長策潛輔」，參加了事件的謀劃。

玄宗對唐隆政變的參與人員，賜功臣號，死後多由集賢院學士撰寫墓誌，都屬恩例。參與者，史書只提到有苑內工匠、萬騎和羽林。見於石刻的近二十位政變參與人員，其基本情況列表於下：

姓名	年齡	父職	本人職位	政變中作用	政變後授官	出處
李儀鳳	不詳	不仕	無	廣奮駿勇，輔衛殄凶。	歷職轅門	《墓誌》開元231
王崇禮	38	不仕	無	當侍從北宮，申威奮武，揮戈電轉，躍馬雲屯。	松州牛頭鎮副	《墓誌》開元340
李仁德	38	不仕	無	奔走電擊，手刀梟鏡（獍）。	右屯衛翊府中郎將	《補正》卷五四

李懷	何德	王守節	屈元壽	李忠義	萬行	朱君同	史思禮	雍智雲	茹義恩	張登山	張安生	劉玄豹	薛義	高德	白知禮	
33	27	36	34	43	22	不詳	43	37	32	45	27	42	33	35	37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不仕	穆州司馬	不仕	宋州醫博士	不仕	仗內侍衛	不仕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不詳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少習戎旅	無	不詳	
告難皇邸，剪除無遺，國祚中興，實賴先覺。	身扞帝座之尊，首掃後宮之孽，率茲左袒，引以靜騶。	戡難奉主。	輔成大業，纂立元勳。	羽翼聖謀。	驂乘代邸而誅諸呂。	不詳	戮褒似于周京，斬呂祿于漢闕。	功參撥亂。	附時而舉，潛識歸真。	獻策金門。	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讎。	公時首唱，實在其中。	不詳	從安區寓，立乎大功。	窮穴誅鋤，荷戈衛主，驂乘翼聖。	
左果毅	右衛扶風郡積善府	延安郡敦化府果毅	上黨郡從善府別將	洋川郡上川戍主	陽城郡延俊府別將	河東壽貴府果毅	絳郡新田府折衝都尉	平陽郡仁壽府左果毅	靜州烈山鎮將	岐州三交府左果毅	寧州靜難府左果毅	果毅	資州夷牢鎮副	絳郡長祚府左果毅	平州白楊鎮將	原州彭陽府左果毅
《補遺》第一輯 156頁	《續集》天寶 094	《續集》天寶 087	《續集》天寶 062	《續集》天寶 051	《續集》天寶 046	《續集》天寶 038	《續集》天寶 019	《續集》開元 176	《續集》開元 090	《墓誌》天寶 270	《墓誌》天寶 264	《墓誌》天寶 249	《墓誌》天寶 145	《墓誌》天寶 008	《墓誌》開元 415, 529 (《二志有異，取後誌》)	

從此表可以看出，參加唐隆政變的人員，很少世家子弟，父祖任官者也很少，本人也多無官守。從姓氏來看，有多位是鮮卑後人和西域胡人。從年齡看，僅有三人是二〇多歲，大多是三〇、四〇多歲的中年人，並不是有些史書所說的市井少年。其中只有王崇禮可能是鍾紹京所率的丁匠。政變後對有關人員的獎官，大多是遠離京城的軍府的中下級軍職，其原因當在多數參與者應屬市井民間的人物，原無職級，稍作獎勵就行。從這些參加者的地位來分析，玄宗當時

在民間雖得到較多的支援，但對守衛宮城的羽林軍並沒有多少實質的掌握，他的舉兵，從力量對比來看，確實是非常冒險的。對於助他起家的這批唐元功臣，玄宗是非常感念的，他在位期間頒佈的詔書中，多此提及對諸人的特別恩獎。這次政變中守衛宮廷而被殺者，也有一方墓誌出土，是任「左金吾衛郎將押北門」的裴昭。

玄宗即位後，大權為其姑太平公主所控制，直到先天二年（七一三）剷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始得親政。此事最初由劉幽求提出。『舊唐書·劉幽求傳』載：「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實」，事情敗露而導致劉幽求、張暉被貶逐。當事人鄧光實墓誌已出土，所述過程與史書不同：「先天初，歸妹竊權，……公義形於色，奮不顧身，與左丞相劉幽求等同心戮力，以輔一人，廷奏奸謀，反為太平公主所伺，言且不密，君幾失臣，遂謫居幽州。」認為鄧是預謀者之一，但廷奏言事，反泄漏了機密，差點導致玄宗的傾危。從事件後鄧雖得改職，但始終沒有入朝，也沒有超過事前的職位，玄宗似乎並不視其為功臣，對其泄漏機密而導致危局，並沒有完全地原諒。另事變當時任都苑總監的范安及墓誌，稱「公推忠奉國，徇義忘身，始預經綸之期，遂偶元亨之會」。知道他參加了這一事件的謀劃。『封禪臺誌』云：「今上翦除凶悖之夕，擢授御史中丞，與大夫東平畢構連制，夜拜明朝，急於用賢。」是玄宗在事變的同時立即拔擢了一批主要官員，迅速穩定了局勢。

二 吏治和教化

玄宗在位以後勵精圖治，其重要舉措就是選用賢相，廣開言路，重視吏治，重視教化。在數量巨大的開天墓誌中，大多提到朝廷和地方官員的政績，提到玄宗多次自擇地方官，當面戒諭，並隨時派員到各地採訪監察，將整肅吏治作為治國的首要大事。這裏僅舉一例。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四），他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作『令長新戒』，賜之，要求各縣皆刻於縣署。此戒宋代尚多有存者，歐陽脩、趙明誠、王象之等即收有河內、虞城、汜水、穰（南陽）、舞陽、房子、赤水等九縣刻石。『金石續編』卷七錄陝西大荔石刻云：

我求令長，保乂下人。人之所為，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征諸善（善字據『玉海』卷三一補）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偽歸真。教先為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

以躬以親。青旌（『玉海』作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金石錄』又有開元二十六年六月『誠牧辛勅』，山東臨沂近年發現張九齡起草的『敕處分縣令』石碑，也是同時奉詔所刻。這些刻石，記錄了玄宗整肅吏治的舉措，可說是達成開天盛世的重要原因。後世流傳很廣的孟蜀後主『頒令箴』、『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的名篇，是受玄宗此作啓發而寫。

放宮人是歷代帝王的重要德政，玄宗時有多次記錄，『本事詩』還有一段宮人在軍衣中寫詩傳情，玄宗發現後放宮女以嫁邊軍的故事。張令暉『室人太原王氏墓誌銘』所寫其妻，就是一位出嫁軍人的宮女：『年符二八，名入宮闈。彩袖香裾，頰昇桂殿；清歌妙舞，常踏花筵。及夫思命許歸，禮嬪吾室。』張令暉的官職是「寧遠將軍守右司禦率」，屬中級軍官，可知『本事詩』所云是確有之事。

玄宗重視教化，其教化要旨可說是三教並重，尤喜道教。玄宗時文禁鬆弛，文人活躍，與這種多元選擇直接有關。歷代帝王都重視以儒學為立國之本，玄宗也不例外。他於開元十年（七二二）親自為『孝經』作注，『頒于天下及國子學』（『唐會要』卷三六）。他在往泰山封禪時，專門去曲阜孔宅親設祭奠。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封孔子為文宣王。現在曲阜所存『修孔子廟碑』，西安碑林所存『石臺孝經』，就是一系列尊儒行動的遺存物。在敦煌遺書中，還有用『孝經注』改寫的通俗歌詞，知當時民間流傳很廣。

禪宗在玄宗時完成北宗禪向南宗禪的過渡，北宗名僧神秀、義福都有碑傳世，被稱為南宗七祖的神會塔銘也已發現，受到禪宗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視。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作『金剛經』注，也『詔頒天下，普令宣講』（『宋高僧傳』卷二四）。後世的『金剛經集注』中有玄宗注，佛典和敦煌遺書中且有唐僧人據玄宗注所作的疏和宣演，但該書始終沒有單行本的原書流存。七十年代對房山雲居寺雷音洞埋藏石經進行清理後，發現天寶元年（七四二）刻石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首有序，為他書所不載，未附詔有『頒示天下』語。這一孤本的發現，玄宗所注三經終於都有了完本。

在三教中，玄宗最熱心倡導的當然是道教。他在位四十多年，有一系列大規模的崇道活動。他前期最信道士葉法善，為其父祖都贈官褒封，有李邕所撰『葉有道碑』和『葉慧明碑』可證。葉法善死後，他又親制『葉真人碑』，當時也曾刻石，只是石本未見流傳。後期與茅山道士李玄靖有很密切的交往，數次相邀入京論道，先後致李的詩書即達

十五道之多，顏真卿『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⑩於此記載頗詳。貞元十四年（七九八）由道士包無際刻于茅山，原石已亡（清楊世沅『句容金石記』卷三），幸賴元人劉大彬『茅山志』卷三全錄了這些贈詩和書札。在注儒、佛二經的同時，他也為老子『道德經』作注，要求「天下諸觀並令開講」，又要求「各州于一大觀勒石」（『冊府元龜』卷五一）。現存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田仁琬刻河北易縣龍興觀『道德經』幢，題「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⑪。另邢臺龍興觀經幢立於次年。河南鹿邑縣太清宮，清代尚存『開元神武皇帝道德經注碑』（『光緒鹿邑縣志』卷一〇下），今不知存否。據今枝二郎『敦煌本玄宗皇帝注老子資料的意義』所考，『道德經注』二卷，『疏』八卷，是由左常侍崔沔和道士王虛真、趙仙甫參議編修，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弘布天下。他宗道的另一重要事件，是于天寶元年（七四二）給老子加尊號，又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文字為通玄真人，庚桑子為洞靈真人。今陝西周至樓觀臺，尚存『褒封四子詔』石刻。

玄宗時道教石刻衆多，在此不能一一介紹。在此只提一下在陝西睿宗橋陵所存『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和近年新發現的『大唐故金仙長公主誌石銘』^⑫。金仙公主是玄宗的第八妹，『誌石銘』且由與其同時就道而名氣更大的妹妹玉貞公主所書。志載其「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碑云「丙午（七〇六）之歲度為女道士」，入道在玄宗即位前，知並非受玄宗即位後崇道的影響。玄宗即位後「於京都雙建道館」，即供金仙、玉貞二公主修道之用。石刻敘其修道過程甚詳。玉貞公主，『新唐書』和李白詩都作玉真公主，而其自書則作玉貞，應予重視。西安另出有『唐故九華觀書師藏形記』，誌主是睿宗的外孫女，蔡國公主之女，「以總髮之年，爰歸我族大鴻臚卿諱偶，即玉真長公主之次子也。」玉真公主年輕時就為女道士，史書上並無其出嫁招駙的記錄。聯係李白詩「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李太白文集』卷七）來看，張卿的父親可能就是這位衛尉張卿。唐代女道士的生活，據此也可推見一斑。

石刻資料顯示，在玄宗以前，太宗的妹夫封言道，王之渙的祖父王德表都曾注過『孝經』、『金剛經』、『道德經』三書，玄宗的做法不是首創，但影響則極其深遠。對三教中最普及而有代表性的著作，作曉暢明白而權威的解釋，讓一般民衆知所依皈，是玄宗實施教化的重要手段。

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玄宗封禪泰山是治世告成的大事，他親書的焜煜輝煌的『紀泰山銘』至今還隻字無損的保留在泰山之巔。被玄宗稱為「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唐會要』卷八）的封禪玉牒，一九二八年被國民革命軍馬步

芳部在泰安車站附近偶然發現，其文云：²⁶

維開元十三年歲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帝祇：臣嗣守鴻名，膺茲丕運，率循地義，以爲人極，夙夜祇若，祈未敢康。賴坤元降靈，錫之景祐，資植庶類，屢惟豐年，或展時巡，報功厚載。敢以玉帛犧齋，梁盛庶品，備茲瘞禮，式表至誠。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此玉牒可視爲開元之治最珍貴的實物，可惜原物今不知所在，上述牒文也僅賴著名學者鄧之誠的抄錄始得爲世所知。

三 宦官干政

宦官干政是唐代政治史上的重大問題。從昭陵所存「張阿難碑」、陝西所出「李愨碑」來看，²⁷唐初的宦官已參與軍事，被太宗視爲「爪牙心膂」，只是對朝政還很少直接發表意見。玄宗可能是從唐隆政變成功中體會到加強內府實力的重要，即位不久，就「大求少年以備內職」。在開元前期，宦官已形成可觀的勢力。洛陽龍門的「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由玄宗御書，高力士領銜，有一百零六位宦官具名，其事由雖僅爲在龍門造無量壽佛像，但那麼多宦官聯合行動，且由皇帝親書，確實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事情。宦官的活動空間，也有很大拓寬。如內謁者監王義仁，既曾「往聘西境」，又曾任「東北軍和國使」，作爲皇帝的使節出使。虢國公楊思勳是玄宗時宦官中，地位僅次於高力士的大閹，「舊唐書·宦官傳」首列其傳。西安出土的他的墓誌稱其「七總戎律，一勸內難，鷹揚五嶺，武鎮六州，斬節二十萬，京觀八十一，可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者也。」並詳細記錄他在眉州、山州、五溪、營府等地的平叛功績。²⁸這顯示玄宗已較多地用宦官來控制軍隊，平定地方叛亂，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顯要。

玄宗時最重要的宦官當然是高力士。玄宗發動政變，他就「攀龍附鳳，公實親焉」，玄宗在位到退位的近半個世紀，他始終在玄宗身邊，是事實上的內相。玄宗宮內的很多秘事，也多是他晚年傳出，至少在今人編的「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中，「高力士外傳」和「次柳氏舊聞」兩書，都源於他的敘述。秦陵所立代宗時潘炎撰「高力士碑」，清代僅存上半截，「金石萃編」卷一百所錄，缺誤尤多。二十多年前此碑的下半截被發現，經拼合大致能恢復全碑；²⁹近年其墓已經發掘，有完整的墓誌出土。³⁰此外，他的生父馮君衡，養父高延福，其兄高元珪的墓誌也已出土，這批資料爲研

究高力士，研究玄宗時的宦官政治，提供了許多極其珍貴的線索。

碑誌所述高力士生平，從大端來說，與史書基本一致，所涉細節問題，則出入頗多。他原為嶺南馮氏的後人，但其祖父是馮盎三子中的那一位，則碑誌本身就有很大的出入。張說開元十七年（七二九）應其請為其父馮君衡作墓誌，說君衡是恩州刺史智岱子，稍後作神道碑，又說是高州刺史智戮子。譚其驥教授認為因他早年入宮，對家世缺乏瞭解，後來僅靠失散二十多年的生母和二兄回憶，難免有出入。是合適的解釋。但他認為當以智戮為是，則未必允當，新見的高力士碑誌，都作智岱，似較可靠。碑誌說其本名元一，史書不載。力士改姓高的緣由，碑誌均敘為武后所賜，與另一說武后以其為高延福嗣子相通。但高元珪墓誌又說元珪武后時避禍改姓高氏，則似改姓在兄弟離散以前。其名力士的由來，『舊唐書』本傳說「與同類金剛」，同時入宮，為入宮前名。高力士墓誌則云其善射，「百發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稱」，神道碑特別說到他隨侍三山宮時曾「一箭射落雙雕。墓誌說力士卒年七十三，有「嗣子正議大夫、前將作少監、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承悅」，又有「養子內給事承信等」，都不見於史書。碑誌敘述他在平定王錡之亂時擊鼓以控制亂勢，在蜀中平南營之叛，也是珍貴的記錄。碑誌因以頌德為主，對其干政之事，多有諱言，但也有較客觀的表述：「公左右明主，垂五十年，布四海之宏綱，承九重之密旨，造膝之議，削稿之書，不可得而知也。」應該說，高力士因他與玄宗之間特殊的私人關係，參與了大量國事的抉擇，他與玄宗之間的私下議論，別人無從瞭解，史書記錄下來的，多有善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開天致治，他也有特殊的貢獻。從他開始，宦官日益左右中央政治，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四 四邊戰事

玄宗時四邊戰事頻仍，但從大端來說，則開元時和多於戰，天寶時戰多於和。開元間玄宗較用心于與邊蕃結好。清末在今蒙古境內發現的由玄宗「御制御書」的「闕特勤碑」，稱頌回紇「爰待朕躬，結為父子，使寇虜不作，弓矢載棄，爾無我虞，我無爾詐」。就是這方面努力的體現。開天間的重要邊將，已出土王忠嗣、高耀、郭英奇、郭虛己、裴仙先等人的碑誌，其他中下層軍將的材料更多，可資研究的問題也極多，在此僅舉與高適有關的幾種石刻為例。

高適『燕歌行』，一般認為是因感張守珪事而作，現張守珪及其子張獻誠、孫張任墓誌都已出土，可資研究的線索很多。張守珪墓誌由中書舍人達奚珣撰寫，其中述其與叛奚和契丹作戰過程云：

公始至幽府，屬降奚叛亡，遂乃精選驍雄，分命追捕，左縈右拂，斬首擒生，林胡奮氣，由是遁迹。加鎮軍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而渠帥可突于素縕狼心，忸於狡計，憑險恃衆，比角舉尾。公於是平練剛日，戒元戎，節鉞生風，戈矛竟野，觀兵營府，頌言征之。仍令辯士，示以禍福，網羅已合，飛走無從，喪其精魄，失其舉措。帳下之士，斬之以降，並奚王屈烈，蕃酋怒厥娘等同日梟首。揚清廟之神謀，掃赤山之祲氣，樹澹林之旗鼓，頌狄隸於公卿，自李牧以來，未之有也。

這一大段的敘述，從事實到文句與『燕歌行』都有不少近似處，儘管墓誌以頌德為主，詩以諷諭為主，放在一起比讀，有資於對詩歌作出允恰的評判。

高適後去隴右哥舒翰的幕府，哥舒翰因對吐蕃石堡大捷而名振一時。『隴右金石錄』有甘肅臨潭石刻『石堡戰樓頌』，作于天寶八載（七四九）七月，即石堡大捷的次月，其中述祝捷情景云：「覽是之勞，樂斯兼情，羽觴肆陳，金管合奏，詞客侍坐，劍人高歌，蒼茫翠微（下缺）。」高適即可能是其中的一員。順便說到，中國學者最近從新出版的俄藏敦煌遺書中整理出『赤鬚將軍歌』殘詩一首，其首數句云：「赤鬚將軍著鐵衣，向。劍殷血污，拂卻人頭不知數。天子遙聞。宮。入門拜首騏驎殿，聖主臨軒問征戰。」據考這位赤鬚將軍就是高適的府主哥舒翰。⁽³⁶⁾

五 楊貴妃事證

現仍立於陝西鳳翔境內的楊國忠爲其父而立的『楊珣碑』⁽³⁷⁾，是一塊對研究天寶後期政治以及楊氏家世，都極重要的石刻。此碑立于天寶十二載（七五三）八月，即楊任相僅九個月之際，題作『武部尚書鄭國公碑銘』，署「御制御書，皇太子臣亨奉敕題額」。玄宗父子一起爲楊國忠稱揚功德，很不平常。此前權相李林甫柄政近二十年，屢興大獄，數次危及太子李亨的地位，李白、杜甫均極敬重的文學家李邕被杖殺的事件，一般認為即是李打擊太子集團的

結果。李林甫的另一手段，則是擴大邊將的勢力以自重，安祿山因此而獨領三鎮。楊國忠在李去世後的第五天領右相，顯然緣於特殊的人際關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李林甫，替玄宗父子，特別是太子李亨出了惡氣。碑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這些語句透出玄宗對楊的充分信任，楊任相之初與太子李亨的關係也算是融洽的。

『楊珣碑』對其先人的敘述，也提供了理清楊氏世系的重要線索。碑云：「曾祖汪，隨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大父令本，庫部郎中，沂三郡守。」「考志謙，青城令。」楊汪，『隋書』卷五六有傳，雖稱爲弘農華陰人，但從其曾祖楊順時已「徙居河東」。汪父琛，官儀同三司。楊汪的子嗣，『隋書』未及。唐初墓誌中，有三方楊家的墓誌。一是『唐故玄武丞楊君墓誌銘』，誌主爲汪子仁方，字懷則，貞觀十九年任梓州玄武丞，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八。此志述楊琛官爲「周使持節和、疊、始三州刺史，互鄉公」。第二方缺題，誌主爲楊基，字政本，官至幽州范陽令，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五十，應爲仁方之弟。此誌述楊琛官與前誌同，另述「曾祖忻，魏鴻臚卿、汾、隰二州刺史，林慮郡公」。第三方爲『大唐故幽州范陽縣令楊府君夫人韋氏墓誌銘』，其夫即楊基，但稱爲「楊汪第五子幽州范陽縣令政本」，知其以字行。對照『楊珣碑』，可知仁方、政本、令本爲兄弟，只是不知道令本在兄弟中的排序。『舊唐書』卷五一「玄宗楊貴妃傳」載其「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璠。」其得寵後，「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鈺，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如果『舊唐書』所載可靠，即不難發現，楊國忠以令本爲曾祖，而貴妃則以令本爲高祖，相隔一輩，即貴妃並不是國忠得從祖妹，國忠則是貴妃的從叔了。當以『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所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爲是，令本應是其曾祖。貴妃之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志謙，而以國忠爲友諒孫，則與『楊珣碑』所云國忠祖爲同一人，這顯然與各種史書的記載有出入。岑仲勉『唐史餘瀟』卷二認爲「新表」中志謙一輩錯位，貴妃祖或應爲友諒。今暫從其說。至於楊順以上，『新表』以爲出北魏楊播之後，現陝西咸陽已出土楊播家族墓誌十多方，尚無從確證，暫不取。

此外，有大和七年『楊迥墓誌』⁽⁴⁾，記其曾祖爲玄珪，祖爲楊錡，父爲光祿卿楊暉，迥官太府寺主簿，其弟楊道則任司農寺丞。這是中唐後楊氏後人僅見的記錄。

綜合此節所述，可排列楊氏世系如下：

順	忻	琛	汪	仁方
			政本	令本
			志謙	友諒？
			珣	玄琰
			國忠	玉環姐妹
			四子	
			玄珪	玄璉
			銜	銜
			道	道

楊貴妃的原夫壽王李瑁，多年前也有一方相關墓誌出土，是其于丁酉歲，也就是馬嵬之變的第二年去世的第六女清源縣主墓誌，由壽王親書。¹²我們藉此可以見到這位與楊玉環曾有結髮之好的窩囊的男人的書迹。

本文寫作中，曾力圖希望在石刻中找到馬嵬之變參與者的資料，但很遺憾，只找到兩名可能在馬嵬的肅宗元隨功臣的資料，無助於對楊貴妃之死的考察。即使在高力士的碑誌中，對此也回避不談。這從另一方面證明，這次導致楊貴妃死亡，並促使玄宗、肅宗父子分手的重大事件，後來並沒有像唐元功臣那樣予以封賞，參與者也不將此作為光榮的歷史來加以敘述，這和後來人的樂於豔談形成鮮明反差。

近幾十年間，陝西、河南的文物考古隊對西安、洛陽的唐代遺址進行了大範圍的發掘和研究，成績卓著，許多都與玄宗一朝的政治，文學有密切關係。比如西安東北郊的大明宮，是玄宗君臣議政的主要場所。一九五七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對其進行了多次發掘，大致弄清了大明宮宮城的範圍和位置，發現著名的丹鳳門，玄武門門址保存尚好，據以繪出了平面和剖面圖。麟德殿的臺基和殿礎都相當完整，可據以看出該殿的大致輪廓。¹³八十年代又有研究古建築的學者對該殿原貌作了推定和圖繪，可據以想見這座唐宮最重要建築的雄姿。最近十年間最重要的發掘，則

是臨潼華清宮遺址的發掘。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幾乎每年冬初都在此居住，少則幾天，長則一直住到次年春天。他與楊貴妃的許多故事，都是在這裏發生的。華清宮遺址的發掘由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組織唐華清宮考古隊，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五年，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發掘，弄清了唐華清宮的結構佈局，清理了御湯、老君殿、朝元閣、梨園等宮內重要建築遺址，其中驪山北麓的一處遺址，很可能就是長生殿的遺址。梨園東半部發掘相當充分，發現其結構極其特殊，外邊回廊周環，內部則分成形制不同的室，發掘報告推測應該是梨園弟子的寢所。待發掘的西庭院據推測應為表演場所，面積約超過四〇〇平方米。已發掘的湯池有星辰湯、尚食湯、太子湯、蓮花湯、海棠湯、宜春湯等八處，其中蓮花湯和海棠湯可以確認是唐玄宗和楊貴妃使用的。蓮花湯又名九龍殿御湯，發掘出的湯池殿遺址面積約二七六平方米，湯池則為橫長橢圓形的青石砌兩層臺式，東西長約一〇·六米，南北寬約六米。海棠湯又名芙蓉湯，貴妃湯，殿址規模約為蓮花湯的一半，是用青石砌成的海棠花狀的兩層臺式池，東西長三·六米，南北寬二·九米，也比蓮花湯小得多，但小巧玲瓏，非常獨特。發掘時，在北牆基發現一楷書的「楊」字，發掘報告認為是石工知為楊貴妃所用的戲作。這兩個湯池都有很好的供水和排水設施，也許是因為這一緣故，兩池經歷宋元明清都還在使用，蓮花湯從明代起，更作為民衆沐浴的混池，一直用到一九六〇年。這兩個湯池的發掘，為研讀有關作品提供了實物參照，現已整飭開放，供遊人觀覽。

六 安史之亂和僞燕文獻

安史之亂綿歷八年，涉及大半个中國，成為唐由盛轉衰的轉捩點。平叛過程，史籍記錄頗詳，重要將領也多有碑誌留存。在此則擬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現有的所有涉及安史之亂的史料，都是站在唐王朝的立場上寫的，從現代學術研究的要求來說，這樣重大事件的另一方，居然全無自身文獻，不能不說是很大的缺憾。在出土石刻中，現能見到二十七方用安史叛方建立的僞燕朝紀年的墓誌，均收入『唐代墓誌彙編』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稍可補文獻的不足。這批石刻大多是唐的士民迫於僞燕朝的形勢而採用其年號，所述內容大多與燕政權無關，從中只能看到燕的勢力所控制的範圍和地域。署名大里（理）評事石鎮撰的『大燕遊擊將軍守左威衛翊府左郎將員外置同正員內供奉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曹公故夫人康氏墓誌銘，可能是惟一偽燕官員家人的墓誌，其中云：「嗣子彥瓌，卓立傑出，挺生天姿。宿昔龍潛，早預紀綱之僕；今承鳳詔，忽如環列之尹。陪遊清切，伏奏明光，玉墀銜聖主之恩，金印表公之德。」⁽¹⁶⁾可據知燕未改唐朝官制，燕的將領已沈浸于新朝君臣關係的喜悅之中。此志作者石鎮，在房山雲居寺碑刻中也有他的文章，應是幽燕的文人，隨叛軍南下洛陽。

一九六六年春在北京西郊豐台唐墓附近發現三枚玉冊，一九八一年對此墓作了發掘，雖毀壞嚴重，仍先後發現玉冊四十四枚，經拼合，為哀冊、諡冊各一套，從而確證此墓是安史之亂魁首史思明的墓，而且是按照帝陵的規格建造的。其中哀冊有云「昭武皇帝崩于洛陽宮玉芝西階」，「付以大業」，「帝朝義孝乃因心，親惟」，「唐有異端，讒人罔極」。⁽¹⁷⁾諡冊有云：「定，天下知歸。」「王業艱難，雄圖克移，乾坤改色。」「備經夷險，振旅耀威。」「熊羆十萬，所向倒戈。」這是現能見到的偽燕朝的唯一官方文字。史思明諡昭武皇帝，他書未載。昭武皇帝是十六國時後燕慕容熙用過的諡號，偽燕當以其後繼者自處。「舊唐書」本傳載史思明被史朝義縊殺於柳泉驛，而此作死於洛陽宮，有所不同，可能是史朝義的掩飾。史載朝義殺父後，一直被困於洛陽，直到敗死，現在卻看到了他為史思明隆重營葬。從玉冊對其戰績大肆頌揚來看，史朝義並不承認其弑父行爲，可能也藉此以籠絡其父的舊部。

安史時期，有一大批天寶名臣陷偽任官而身敗名裂，其中陳希烈的墓誌⁽¹⁸⁾已經出土，達悉珣有幾種石刻出土，除前面提到的張守珪墓誌外，還有寫于天寶間的「東渭橋記」，對研究兩京間的交通很重要。

七 文人事迹及作品

石刻對盛唐文學研究的價值，可講的很多，令人利用的也很多，在此僅略舉要點。

發現一批重要作者的墓誌，三十年代王之渙墓誌的發現，曾引起很多學者的關注。同時出土的李邕及其家族墓誌，意義也很重要。繼六十年代初張九齡在廣東發現後，近年又在洛陽發現了張說的墓誌⁽¹⁹⁾。這兩位都是開元名相和文學宗匠。其他玄宗時詩人碑誌發現的還有崔沔、韋希損、王無競、崔泰之、張軫、郭虛己、韋濟、蔡希周、趙冬曦、神會、李峰（神道碑）、陳希烈、元德秀等。

石刻所見玄宗朝的政治與文學

為重要作者補充了新的作品。如賀知章，名聲大而傳世文章很少，已有四方他撰文的墓誌被發現。杜甫兩位關係最好的朋友，鄭虔曾被玄宗贊為「三絕」，蘇源明被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認為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士，兩人存世作品都很少，現各可補見兩篇碑誌，彌足珍貴。類似情況很多，不一一例舉。

可資生平考訂。盛唐詩人李頎的生平資料不多，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推定其應卒於天寶十二年。《河岳英靈集》結集以前，而其作品的下限只到天寶六年為止。《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收其天寶十載六月撰《故廣陵郡六合縣丞趙公墓誌》，署「前汲郡新鄉縣尉趙郡李頎撰」，可知其十載還在世。誌主是其內兄，墓誌也提供了瞭解李頎家室情況的重要線索。再如山西臨晉王顏撰《王卓碑》^②，指出唐人冒認顯姓的現象，特別揭出張說越認范陽，王維兄弟越認瑯琊，對考訂諸人的譜系，瞭解唐代士人多冒郡望的通習，也很重要。

揭示了以往不為人知的重要作者。賀知章撰《鄭績墓誌》^③，記其使吐蕃撰《柘州記》一卷，綜理群書著《新文類聚》一百卷，依《春秋》作《甲子紀》七十篇，掌地圖撰《古今錄》二百卷，另有文集五十卷，有藏書一萬卷。數量如此巨大的著作和藏書，無一傳世，且不見任何一書著錄。

文學群體的記載。如《蔡希周墓誌》^④，較多地記錄了開天間丹陽詩人間的交往，可與殷璠《丹陽集》殘文比讀。《李琚墓誌》^⑤則記錄了他在洛陽與馮用之、韓景宣、劉晏、王端等文學交厚的來往。

家族文學研究。近代以來的石刻，因多為大規模基建和系統發掘而出土，許多墓誌都是家族成系列出土的。盛唐作者中，如王之渙墓誌出土時，其祖父墓和其妻墓誌也同時出土。長安發現盧綸家族墓誌，包括他父母和弟盧綬夫婦的四方墓誌。開元間因主持貢舉放顏真卿、蕭穎士等及第而名盛一時的孫逖，本人墓誌雖無發現，但其子孫的墓誌已發現三十多方，可以看到這個以文學名家的家族，從武后時期一直到五代中期兩個半世紀的發展史。

八 開天雜史作者事證

現存十多種開元天寶雜史，是研究這一時期政治、文學的最重要依據。有些作者，如寫《次柳氏舊聞》的李德裕，傳記資料極多，雖然在其洛陽家族墓中出土了一批墓誌，涉及大量重要史事，但對研究開天史則意義不大。有些作者

傳記資料很少，或其著作曾有爭議，石刻的新資料更顯可貴。下面略舉幾例。

「高力士外傳」作者郭湜，過去僅據書前原署知他大曆中任大理司直。現據其為其兄郭嵩撰墓誌，知他是太原人，大曆四年（七六九）任登封縣令，又據北京圖書館藏『李華墓誌』，知他大曆十三年（七七八）任吏部員外郎。

「安祿山事迹」是記錄安史之亂的存世唯一專書，署華陰縣尉姚汝能撰，但前人始終未能確定姚為何時人。陝西出土會昌五年（八四五）『趙文信墓誌』，署「鄉貢進士姚汝能撰」，據此可知姚仍華陰尉應為此若干年後事。『安祿山事迹』的成書，距安史之亂已近百年。

鄭嵎著名長詩『津陽門詩』有大量自注，其價值不亞於幾種雜史。以往僅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中和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的記載，知道鄭嵎字實先（一作實光），大中五年進士。其詩後世雖曾單刻為一卷，其實均出『唐詩紀事』卷六一，並無別集流傳。李述撰『唐故潁州潁上縣令李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合祔玄堂誌』：「有弟曰嵎，少耽經史，長而能文，舉進士高第，歷名使幕揚州大都督府參軍，堂叔碣，亦以進士擢第，殿中侍禦史，累佐盛府，並為時彥，必振大名。」可知他的仕歷和當時名聲，且據此誌可瞭解其家世淵源。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是記錄玄宗時期逸事的重要著作，但因所記不盡為史實，前人或疑為偽書，對此，『四庫提要』已有所澄清。該書在中國的傳本，沒有序與後記。日本所存寬永十六年（一六三九）刊本，末有紹定戊子（二二四八）陸子適（當即陸游之子陸子通）題記，可信出於宋刊本。卷首有王仁裕自序，為中國傳本所無，錄如下：

仁裕破蜀之年，入見於明天子，假途秦地，振旆鎬都，有唐之遺風，明皇之故迹，盡舉目而可觀也。因得詢求事實，采摭民言，開元天寶之中，影響如數百件，去凡削鄙，集異編奇，總成一卷，凡一百五十九條，皆前書之所不載也。目之曰『開元天寶遺事』。雖不助於風教，亦可資于談柄，通識之士，諒無訾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云：「蜀亡，仁裕至鎬京，采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即節引此序，可證此序不偽。兩『五代史』都有王仁裕傳，『舊五代史』本傳殘缺過甚，『新五代史』本傳敘及其在西京王思同幕下事，也較簡略。『隴右金石錄·宋上』收宋初名臣李昉撰寫『王仁裕神道碑』，敘其生平頗詳，足補史傳的不足。碑敘王歸唐後，先任雄武軍節度判官，罷職退歸，為「南梁主帥王公思同以舊知之故，逼而起之」，後又隨王思同至長安，「泊居守鎬京，參贊留務」。用語與前錄序可以印證。王思同遷西京留守是長興四年（九三三）八月事，至次年四月因抗

距潞王被殺。『開元天寶遺事』應即寫於這一時期。神道碑列舉王氏平生著作達十多種，不及此書。中國所存此書各本，均僅存一百四十六則，與和刻本一致，已稍有殘缺。

二〇〇三年一月于東京早稻田奉仕園

注

- (1) 崔玄暉墓誌，周紹良等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以下略《墓誌》）開元〇二六所收。武懿宗墓誌，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以下略《補遺》）第二輯一四頁所收。李多祚墓誌，『考古』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刊拓本。
- (2) 韋洸墓誌，『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期刊拓本，又《墓誌》景龍〇一一所收。韋泚墓誌，《補遺》第三輯三九頁所收。
- (3) 事見于《墓誌》景龍〇一九『裴覺墓誌』。
- (4) 事見于《墓誌》開元二二七『賀蘭務溫墓誌』。
- (5) 事見于『鄭氏墓誌』，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以下略《續集》）天寶一〇八所收。
- (6) 獲鹿本願寺造幢題名，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希古樓刊本；以下略《補正》）卷四六所收。
- (7) 袁州別駕薛府君墓誌銘，高峽主編『西安碑林全集』（廣東經濟出版社·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以下略《全集》）卷七八所收。
- (8) 王光庭『薛徹墓誌銘』，『文物季刊』一九九七年三期刊拓本，又《補遺》第七輯三七頁所收。
- (9) 裴昭墓誌，《墓誌》景雲〇一八所收。
- (10) 鄧光寶墓誌，《墓誌》開元一九五所收。范安及墓誌，《續集》開元二七八所收。封禪墓誌，《補遺》第四輯一六頁所收。
- (11) 『集古錄跋』卷六，『金石錄』卷九，『輿地碑目』卷四。

- (12) 『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山東臨沂市發現唐代石碑」。
- (13) 宋王明清『揮塵餘話』卷一引「野人閒話」。
- (14) 室人太原王氏墓誌銘，《續集》開元一六八所收。
- (15) 修孔子廟碑，清王昶『金石萃編』（影印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以下略《萃編》）卷七二所收。石台孝經，《萃編》卷八七所收，又有日本二玄社一九七三年影印本。
- (16) 神秀碑，《補正》卷五〇所收。義福碑，《補正》卷五五所收。神會塔銘，《續集》永泰〇〇二所收。
- (17) 吳夢麟『房山石經本唐玄宗注 金剛經 整理記』，刊『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二期。
- (18) 葉有道碑，《萃編》卷七一所收。葉慧明碑，清陸耀燄『金石續編』（影印同治雙白燕堂刊本）卷六所收。
- (19) 事見于『道藏』所收「葉真人傳」。
- (20) 《萃編》卷一百所收。原石已殘毀，有宋拓留存。
- (21) 陳垣『道家金石略』據藝風堂藏拓錄易州道德經碑附敕。
- (22) 《萃編》卷八三所收。
- (23) 收入『敦煌和中國道教』，大東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 (24)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萃編》卷八四所收。同誌石銘，《續集》開元一四五所收，又《補遺》第一輯一三五頁所收。
- (25) 唐故九華觀書 師藏形記，《續集》永貞〇〇一所收。
- (26) 紀泰山銘，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一（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版『骨董瑣記全編』二八四頁）所收。
- (27) 張阿難碑，《萃編》卷五八所收。李愨碑，見于『文物』一九六三年六期刊李季春「唐李潛碑考證」，又《補遺》第一輯一七頁所收。
- (28) 事見于常無逸碑（《補遺》第三輯一三頁所收）。
- (29) 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萃編》卷八四，《補正》卷三三所收。
- (30) 事見于《續集》開元二二一。
- (31) 邢璣『大唐故驍騎大將軍楊公志銘』，刊『唐長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又《墓誌》開元五一五所收。

- (32) 潘炎撰高力士碑，《補遺》第一輯三五頁所收。
- (33) 高力士墓誌，《補遺》第七輯五九頁所收。
- (34) 馮君衡墓誌，《續集》開元〇九二所收，又《碑林集刊》第三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所收。高延福墓誌，《墓誌》開元一八七所收。高元珪墓誌，《補遺》第三輯一二頁所收。
- (35) 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的政治歷史地理」（《歷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五期）。
- (36) 關特勤碑，李文田「和林金石錄」（上虞羅氏校刻本）所收。
- (37) 王忠嗣碑，《萃編》卷一百所收。高耀碑，《續集》建中〇〇八所收。郭英奇碑，《補遺》第六輯八三頁，又《全集》卷一九六所收。郭虛己碑，《文物》二〇〇〇年一〇期刊拓本。裴仙先碑，《唐研究》第六卷刊錄文。
- (38) 此據「唐研究」第五卷刊「唐張守珪墓誌淺釋」的錄文。《全唐文補遺》第六輯六二頁所錄文缺誤較多。
- (39) 府憲展「赤鬚將軍歌 初探」（首都師範大學「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初編」打印稿），另參徐俊見示據「俄藏敦煌文獻」第一七冊三六〇頁重錄詩。
- (40) 楊珣碑，《萃編》卷八九所收。
- (41) 楊迥墓誌，《墓誌》大和〇七六所收。
- (42) 清源縣主墓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天津古籍書店一九九一年影印本）第一冊一四七頁所收。
- (4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 (44) 華清池湯池遺址海棠湯遺址平面圖和帶「楊」字砂石，《文物》一九九五年十一期刊張鐵寧「唐華清宮湯池遺址建築復原」附圖參看。
- (45) 本段據陝西省文物管理局·駱希哲編著「唐華清宮」（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張鐵寧「唐華清宮湯池遺址建築復原」（《文物》一九九五年十一期），葛承雍「唐華清宮沐浴湯池建築考述」（《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 (46) 曹公故夫人康氏墓誌銘，《續集》聖武〇〇三所收。
- (47) 「北京豐臺唐史思明墓」（《文物》一九九一年九期）。

- (48) 陳希烈墓誌，《續集》永泰〇〇三所收。
- (49) 張九齡墓誌，《文物》一九六一年六期刊拓本。張說墓誌，《文物》二〇〇〇年十一期刊拓本。
- (50) 王卓碑，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影印光緒刻本）卷八所收。
- (51) 鄭績墓誌，《補遺》第一輯一一六頁所收。
- (52) 蔡希周墓誌，《補遺》第六輯七四頁所收。李琚墓誌，《墓誌》天寶二二四所收。
- (53) 郭湜墓誌，《補遺》第四輯五六頁所收。
- (54) 李華墓誌，《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本）第二七册一五九頁所收。
- (55) 趙文信墓誌，《續集》會昌〇一七所收。
- (56) 鄭氏合祔玄堂誌，張鈞《千唐誌齋藏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一三〇頁所收。